

## 1964 年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问题再探讨\*

高天宜

**【内容提要】**对研究东非历史和泛非主义思想而言,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是学术界的一个基础问题,其重点是联合的原因、动机及其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坦桑联合的看法基本围绕“冷战政治”以及“泛非主义思想”两大模式进行讨论,然而这两种观点实则都从结果反推原因,未能解释坦桑尼亚作为非洲延续至今唯一由两个独立主权国家联合组建的新国家的特殊性,同时缺乏对坦桑双方政治领导人动机的深入理解。笔者认为,虽然坦桑双方领导人对于联合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联合既符合双方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冷战背景下,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与泛非主义思想的高度融合,其背后展现出非洲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转折。

**【关键词】**坦桑联合;冷战政治;泛非主义;尼雷尔

**【作者简介】**高天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政治史、中非关系史、非洲思想史(北京,100101)。

1964 年 4 月 26 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宣布组建为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 (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sup>①</sup>,坦桑尼亚成为非洲延续至今唯一由两个独立主权国家联合组建的新国家<sup>②</sup>,其诞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编号:2024QQJH083)的阶段性成果。

① 1964 年 10 月 29 日,更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② 1958 年,加纳与几内亚在独立后曾组成非洲国家联盟 (Union of African States),马里于 1961 年加入,但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最终并未合并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生不仅是该国历史上的新起点、泛非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还打破了欧洲人为非洲划分的“国家边界”。<sup>①</sup>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作为历史上两个从未统一，独立时具有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民族构成、宗教状况和对外关系的国家，能够自愿地、和平地合而为一成立联合共和国，实属当代非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罕有的现象。学术界关于坦桑联合的探讨从未停止，然而，即便是坦桑尼亚最高学府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系主任巴卡里也不得不承认，“尽管现存大量关于坦桑联合方面的文献及论文，但在探寻其联合主次原因时，仍引发诸多争议与混乱”。<sup>②</sup>

目前，学术界对坦桑联合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广泛认可，笔者称其为“冷战政治决定论”，其主张坦桑联合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sup>③</sup>另一种观点笔者称其为“泛非主义决定论”，由非洲学界及坦桑尼亚官方所宣扬。该观点认为，坦桑联合是坦噶尼喀总统朱利叶斯·K. 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为实现泛非主义理想做出的一次尝试，同时对“冷战政治决定论”进行了批判。<sup>④</sup>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是一场关于坦桑联合“外因”与“内因”的争论，但实则都偏于宏观背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两种观点都忽略了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关键历史人物在坦桑联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两种观点都未能从20世纪60年代非洲政治思潮的角度出发，分析为何只有坦桑尼亚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联合。因此，本文主

① John Jingu, “The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In Search of a Viable Structure”,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2014, p. 101.

② Mohammed Bakari, Alexander A. Makulilo, “Between Confusion and Clarity: Rethinking the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after 50 Years”,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2014, p. 2.

③ 实际上，此说法在坦桑尼亚1964年联合之初就已产生，威廉·托多夫（William Tordoff）将坦桑联合视为尼雷尔保障坦噶尼喀安全的结果。阿姆里特·威尔逊（Amrit Wilson）则直言坦桑联合由英美联合策划，其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东非蔓延的手段。后世学者基本延续这一思路进行分析。参见 William Tordoff, “Politics in Tanzania”, *The World Today*, Vol. 21, No. 8, 1965, pp. 351-360; Amrit Wilson, “Revolution and the ‘Foreign Hand’ in Tanzan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4, No. 19, 1989, pp. 1031-1033.

④ 坦桑尼亚学术界建制派学者的著作可参见 G. Mwakikagile, *The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Product of the Cold War?* Pretoria: New Africa Press, 2016。西方学界部分学者也对此表示认同，可参见 Ethan Sanders, “Conceiving the Tanganyika-Zanzibar Union in the Midst of the Cold War: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2014, pp. 35-70。

要基于来自坦桑尼亚、美国、英国等国的一手材料，在梳理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各自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力图分析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的根本动机，以探究 20 世纪 60 年代坦桑联合的根本原因。

## 一 学术界两种观点产生的逻辑及问题

对于坦桑联合问题研究的第一种观点“冷战政治决定论”是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最为常见的说法。该说法的核心逻辑是：坦桑尼亚的联合源于外部冷战大国的干涉，坦桑双方出于安全考虑被迫联合。

该说法又分为两种派别，一派以西方学界为代表，该派认为，坦桑联合的最重要原因在于 1964 年桑给巴尔革命后，坦噶尼喀对桑给巴尔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势力感到担忧，认为桑给巴尔将对坦噶尼喀乃至东非构成安全威胁，于是采用联合的方式阻止桑给巴尔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世界希望将坦桑联合塑造成冷战政治阶段性的胜利。桑给巴尔在独立前便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接触密切，西方国家将发生革命后的桑给巴尔视为非洲的“古巴”<sup>①</sup>而迟迟不承认。另外，英国驻桑给巴尔最后一任大使 T. L. 克罗斯特威特 (T. L. Crosthwait) 在其告别信中认为，“英国迟迟不承认共产主义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影响力的迅速巩固。(坦噶尼喀的) 尼雷尔总统促成了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的联合，以破坏桑给巴尔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力量”。<sup>②</sup> 时任美国驻桑给巴尔的领事长弗兰克·C. 卡卢奇 (Frank C. Carlucci) 在 20 多年后仍然坚信，“坦桑联合计划是由美国驻坦噶尼喀大使威廉·伦哈特 (William Leonhart) 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使坦噶尼喀摆脱桑给巴尔共产主义的影响”。<sup>③</sup>

① 1964 年 1 月 14 日桑给巴尔革命之后，《纽约时报》引用被桑给巴尔革命政府驱逐的记者罗伯特·康利 (Robert Conley) 的话，“非洲民族主义者并未参与桑给巴尔革命，这可能会让桑给巴尔成为非洲的古巴”。参见“Havana Radio Monitor Files 1961-1968”，MS Miami, Series I, Associated Press Corporate Archives, AP17.2, Box 12, Folder 28, 1964. 1. 14-1. 1。

②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ommonwealth Relations”, Volume XV, January-December, 1964, Confidential Print Africa, DO-201-15, p. 546.

③ 卡卢奇曾多次参与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在非洲的政治行动。“Ambassador Frank Charles Carlucci”, III, 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1997. 4. 1, p. 29.

另一派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将坦桑联合最为重要的原因归于坦桑双方担心西方国家对桑给巴尔进行经济封锁,为阻止西方的干涉,采取联合的方式抵御这种威胁。<sup>①</sup>在坦桑尼亚国内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坦桑联合同样被描述为确实由外部威胁推动形成,只不过该说法的原因替换成,如果不联合,桑给巴尔总统阿贝德·A.卡鲁姆(Abeid A. Karume)及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则“无法在反革命的危险中幸存下来”。<sup>②</sup>

“冷战政治决定论”过于强调国际政治下美苏对抗的冷战因素,将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视为冷战政治在非洲一隅的又一体现。然而,根据档案记载,尼雷尔不止一次提出,桑给巴尔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卜杜拉·巴布(Abdullah Babu)对坦噶尼喀没有威胁。在尼雷尔对巴布的解读中,他认为“巴布首先是非洲人”。<sup>③</sup>在尼雷尔看来,桑给巴尔作为新政府理应拥有武器,虽然武器是苏联所给予的,但是“我们非洲所有的人都在接近不结盟,有些人来自对(冷战)一方的承诺,有些人则来自另一方”。<sup>④</sup>由此推之,尼雷尔并不需要单纯针对桑给巴尔的巴布而采取国家联合这样较为激进的方式。冷战并非坦桑联合的根本原因。

学界存在的第二种观点称为“泛非主义决定论”。其理论基础在于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之间存在广泛的历史联系,包括“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受桑给巴尔素丹政府管辖”。<sup>⑤</sup>

关于这一说法,公开资料最早可追溯至尼雷尔在1964年4月25日国

① 较为典型的分析有裴善勤编著《坦桑尼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46~147页。此外,仍有部分学者尝试通过引用伊恩·斯佩莱(Ian Speller)的论文试图证明这一论点,但斯佩莱的论文明确表示,“坦桑联合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斯佩莱的主要论点是英美在这一时期对非洲施加军事影响的困难,绝非表示英国准备干涉。可参见Ian Speller,“An African Cuba? Britain and the Zanzibar Revolution, 1964”,*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35, No. 2, 2007, p. 303。

② M. Maalim,“The Union between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and the Right of Secess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Chris M. Peter, Haroub Othman, eds, *Zanzibar and the Union Question*, No. 4, Zanzibar: Zanzibar Legal Services Centre Publication Series, 2006, p. 127。

③ “Ambassador Leonhart’s Cable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Picard and Other Americans Who Were Arrested in Zanzibar”, Department of State,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CK2349143221, 1964. 1. 17。

④ “Summary of U. S. Ambassador William Leonhart’s Discussion with Tanganyikan President Julius Nyerere Regarding a Possible Communist Takeover in Zanzibar”,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CK-2349162141, 1964. 3. 28。

⑤ [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15页。

民议会上对坦桑联合原因的阐述。他认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是睦邻友好国家……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政府决定两国联合，是基于非洲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利益。这样做是考虑整体的利益，并没有其他的原因”。<sup>①</sup> 这种说法也成为坦桑尼亚官方至今为止的说辞。在坦桑尼亚学界，长期以来将其视为解释坦桑之间联合的基础。<sup>②</sup>

“泛非主义决定论”的问题在于，它未能解释坦桑尼亚于非洲独立运动大背景下的特殊之处。换句话说，它未能解释非洲迄今为止只有坦桑尼亚为政治联合的国家。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整体的政治想象角度来看，在当时通过跨越殖民地划分的界线建立联邦制的想法并不罕见。库伯曾断言，非洲各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在摆脱殖民帝国走向独立的问题上，并非所有寻求独立的领袖都考虑建立民族国家。<sup>③</sup> 在泛非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地区基本上认同一种观点，即尽管领土民族国家体现了摆脱殖民主义走向独立的愿望，但它们也可能造成政治冲突。这种问题的出现，既是因为1945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泛非大会未能对各殖民地的非洲政治家选择独立的方式或未来政治道路进行统一，也因为如果依照殖民者划分的边界进行独立，可能会在非洲独立之后产生政治经济上的“巴尔干化”<sup>④</sup>问题。

所以，如果按照“泛非主义决定论”的逻辑，坦桑联合理应延续东非联邦（East African Federation）的道路，即坦桑联合是东非联邦建设的一部分。<sup>⑤</sup> 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却被学界忽略的事实，即在坦桑联合

① [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16~217页。

② Richard Mbunda, “The Union and the Zanzibar Statehood Question”,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2014, pp. 140-141.

③ 参见 Frederick Cooper, *African in World: Capitalism, Empire, Nation-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0-65.

④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属西非的独立史。法国1958年推动“法兰西联邦”取代“法兰西共同体”，使法属西非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消失，造成法属西非出现类似问题。参见〔肯尼亚〕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第147~148页。

⑤ 东非联邦设想最早诞生于1958年成立的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将各个殖民地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将地方民族主义视为新兴独立国家的一种严重威胁。尼雷尔是东非联邦的倡导者，但自1960年东非联邦正式被提上议程后，这一构想饱受非洲政治界争议，三国的政治领导人也一直无法就东非联邦问题达成共识。

发生半个月前,东非联邦的设想就已经宣告破灭,造成东非联邦破灭的正是尼雷尔本人。

1964年4月10日,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方关于东非联邦的会谈实际上是三国组建东非联邦最后的机会,但这次会议却在尼雷尔的影响下未能达成协定。肯雅塔曾在4月7日的内阁会议中表示,“肯尼亚将提出四国联邦作为第一和最佳选择……如果卡鲁姆未能出席,且未达成协议,会继续提出三国联邦,为桑给巴尔留有余地……如果三国联邦未能成立,肯尼亚会提议立即组建肯尼亚—坦噶尼喀联邦”。<sup>①</sup>实际上,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肯雅塔的决心。但在此次会议上,坦噶尼喀方面以威胁退出东非共同市场为由,提出对肯尼亚与乌干达的进口商品设置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的经济贸易。<sup>②</sup>乌干达领袖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认为,“坦噶尼喀似乎认为它可以对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商品征收关税,拥有自己的货币,并冻结两国之间的贸易,同时仍然保持在东非市场上的一切经济活动,这对乌干达而言绝无可能”。<sup>③</sup>所以,尼雷尔虽然自称无意退出东非共同市场,但坦噶尼喀贸易壁垒的设立事实上导致东非联邦经济基础的终结。

如果说,坦桑联合是追寻东非联邦的道路以延续泛非主义思想,那么,这种逻辑与尼雷尔意图终结东非联邦的事实产生了矛盾。换言之,尼雷尔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按照原先构建东非联邦的设想对坦桑进行联合。

早在1964年2月2日,美国就桑给巴尔革命后的局势向坦噶尼喀大使提出“十二道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与尼雷尔协商,其中最后一个问题便是了解“尼雷尔对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之间实行联邦制的看法”。<sup>④</sup>随后,尼雷尔在与伦哈特的会谈中矢口否认坦桑联合的可能性,并指出“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政府在政治上关系密切,但双方不存在任何联合的

① “Kenya Will Propose a Four-Nation Federation as First Choice”, Johnson Library, NSF, Countries, Kenya, Vol. 1,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CK2349360558, 1964. 4. 7.

② “East African Leaders’ Talks Open”, *Times*, 1964. 4. 11, p. 7.

③ “Differences in East Africa”, *Times*, 1964. 4. 13, p. 11.

④ “U. S. Government Expresses Concern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Zanzibar,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CK2349151397, 1964. 2. 2.

可能性，桑方加入东非联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sup>①</sup>

所以，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洲而言，以泛非主义的形式，联合各个独立国家是一种常见的政治讨论。然而，东非联邦未能形成的原因，部分可以归于非洲民族主义的兴盛，这股力量不仅反对殖民统治，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基于新独立国家的身份认同。<sup>②</sup>

那么，坦桑联合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尼雷尔对坦桑联合的想法从1964年的2月到4月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说坦桑联合具有特殊性呢？

## 二 坦桑双方政治领导人动机

既然1964年坦桑联合既非冷战政治因素所决定，也并非泛非主义的结果。鉴于坦桑联合事件是一次小范围的秘密政治行动，当时积极参与其中的冷战大国甚至不知情。那么，这种动机必然从坦桑联合的关键性人物，即坦噶尼喀的尼雷尔与桑给巴尔的卡鲁姆之间探寻。

由于在坦桑联合过程中，主动推动的一方是坦噶尼喀，我们首先要从坦噶尼喀的历史中找出尼雷尔的真实动机。

对于尼雷尔而言，促使其推动坦桑联合的直接原因是坦噶尼喀兵变后产生的泛非主义领导权的问题，其本质是坦噶尼喀“非洲化”问题的延续。

虽然坦噶尼喀的独立相对其他东非国家而言较为顺利，然而，坦噶尼喀独立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并非与欧洲殖民者的斗争，反而是坦噶尼喀自身的“非洲化”问题。“非洲化”问题的雏形最早从1956年尼雷尔在联合国发表的声明便可看出，声明认为，需要“给非洲人和非非洲人官员同样的平等代表权。这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但是我们要求把这当作把国家建设为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志”。<sup>③</sup> 在尼雷尔心目中，英国殖民统

① “Cable Regarding U. S. Ambassador William Leonhart’s Meeting with Tanganyikan President Julius Nyerere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Zanzibar”,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Gale Group, Inc., CK2349162133, Feb. 3, 1964.

② 参见 Frederick Cooper, *African in World: Capitalism, Empire, Nation-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66–89.

③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8页。

治之后坦噶尼喀非洲人与非非洲人之间实现平等，是其独立前的政治奋斗目标。

然而，坦噶尼喀非洲化问题在 1958 年之后逐渐恶化。1958 年尼雷尔所代表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 National Union，简称“坦盟”）赢得大选之后，坦噶尼喀的政治斗争转为坦噶尼喀内部的非洲民族主义党派斗争。坦噶尼喀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sup>①</sup> 主张驱逐欧洲人与亚洲人，提出建立“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Africans）。<sup>②</sup> 这样的主张直指尼雷尔坚持坦噶尼喀内部平等问题。在尼雷尔的思想当中，坦噶尼喀的人权平等并非如殖民政府在议会当中所采用的议会代表制，即平等是建立在“开化”的基础上的理念，采用三族分立的方法。<sup>③</sup> 坦盟在赢得 1958 年选举后，以打破“财富和受教育程度被当作衡量人权或公民权的标准”<sup>④</sup> 为由，彻底改变英国殖民政府所提出的“种族均势”选举理念。所以，归根结底，尼雷尔希望构建的是一个不以“种族”，以“国民”身份为划分基础的坦噶尼喀。“非洲化”的核心矛盾是如何去定义“非洲人”或“坦噶尼喀人”。

1960 年 9 月，尼雷尔讲话时强调：“我们抵制了作为独立手段的暴力和违法行为的诱惑。坦噶尼喀人民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没有成为种族主义者。”<sup>⑤</sup> 此时，尼雷尔认为“非洲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民族主义的热情需要建立在法律与理性之上。但在坦噶尼喀国大看来，这种“理性”则建立在政治上与非非洲人分享的基础上。坦噶尼喀国大对坦盟对“非洲民族主义”诠释的批判主要以其组建的责任政府“为均衡权力而将政策倾向于非非洲人”，致使“欧洲人和亚洲人各有 11 个席位，而其余 50 个席位需要选举产生”<sup>⑥</sup> 和“建立的新政

① 为了与南非著名的非洲国民大会进行区别，简称为“坦噶尼国大”。

② Paul Bjerk, “Julius Nyere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vereignty in Tanganyika”,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8, p. 33.

③ 在议会中，殖民政府希望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的席位比例为 1 : 1 : 1。然而，据估算，1961 年坦噶尼喀大陆非洲人共有 1045 万人，亚洲人有 10.24 万人，欧洲人有 2.23 万人。参见 *Tanganyika Statistical Abstract 1962*, Dar es Salaam: Government Print, 1962, p. 11。

④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 47 页。

⑤ 转引自 Sophia Mustafa, *The Tanganyika Way*, Dar es Salaam: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1961, p. 128, 这段话在尼雷尔的文选中被删去。

⑥ “Responsible Government for Tanganyika Next Year”, *Tanganyika Standard*, Dec. 16, 1959, p. 1.

府不会只为非洲人服务”<sup>①</sup>为切入点进行反驳。坦噶尼国大将坦盟塑造为一个“不为非洲人服务却可以为其他种族服务”的党派，其宣扬的观点很快让坦盟内部出现不同声音。坦噶尼喀的政治斗争，也让尼雷尔在独立前的1961年制宪会议开幕式上不禁感叹，“假设坦噶尼喀早日完全独立的目标没有遇到问题，那是自欺欺人……我希望成立一个政府，而过去一段时间的分歧则是民族主义运动与公务员政府之间的矛盾”。<sup>②</sup> 双方矛盾集中体现在独立后坦噶尼喀公民的权利划分准则上。尼雷尔对此解释说：“如果在坦噶尼喀我们把公民权和对祖国的忠诚割裂开来，而与肤色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将会继续打破原则，我也听说在这里有人已经这么做了。我已经听到过好多次，我也注意到‘土生土长的非洲人’这一词语。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开始区分不同的非洲人了。”<sup>③</sup>

由此观之，尼雷尔在独立后一直致力于维护种族平等的理念，但这种理想使他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危险的代价。这种代价最明显的体现是坦噶尼喀发生于1964年1月的兵变。兵变的直接原因是士兵对自己的薪水 and 政府非洲化政策的不满。尼雷尔在兵变前曾表示，“不论是出于原则问题的考虑还是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对坦噶尼喀公民的歧视传统必须根除”。<sup>④</sup> 这实际上预示着坦噶尼喀将修正非洲化政策自实施以来的各项问题，意图再度放缓非洲化的步伐。

正是因为坦噶尼喀兵变，尼雷尔开始反思其政治思想，从原先希望构建一个“规模越大越好的政治实体”<sup>⑤</sup>——东非联邦，转向对国内激进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妥协。这种妥协体现为党内的激进非洲民族主义者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整个兵变事件中，奥斯卡·坎博纳（Oscar Kambona）等通常被认为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者，让坦噶尼喀避免走向像刚果一样分裂的道路。此后，坎博纳等人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坎博纳本人甚至一跃成为坦噶尼喀的第二号政治人物，在坦盟内部拥有仅次于尼雷尔

① “‘We Don't Intent to Risk Good Rule’—Kawawa”, *Tanganyika Standard*, July 10, 1961, p. 3.

② *Report of the Tanganyika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1, p. 12.

③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87~88页。

④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90页。

⑤ “Mr. Nyerere's Plan for Federation”, *Times*, Nov. 9, 1960, p. 7.

的话语权。这些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也将希望构建一个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政府提上日程。<sup>①</sup>

对于卡鲁姆而言，桑给巴尔革命后的领导权归属问题是其推动坦桑联合的根本原因。在联合问题上，桑给巴尔方面支持联合的人寥寥无几，甚至连卡鲁姆自己都再三犹豫。真正让卡鲁姆下定决心选择联合的主要原因，是卡鲁姆与巴布之间存在的政治矛盾。<sup>②</sup> 卡鲁姆在坦桑联合之后，立即采取措施肃清党内政敌，维持自身在桑给巴尔的统治，其主要目标便是驱逐巴布与前乌玛党<sup>③</sup>的势力，将绝大多数前乌玛党成员送往坦桑尼亚大陆。

正是由于尼雷尔与卡鲁姆在对待联合一事上态度的不同，尼雷尔意图向坦噶尼喀的非洲化问题妥协，打造一个泛非主义典型案例，卡鲁姆则是出于其内部政治斗争目的，这使得双方从一开始在对待坦桑联合问题上的态度有着很大差异，这种认知差异的历史积累也是造成当下坦桑尼亚内政问题的政治根源。

### 三 坦桑联合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坦桑联合自一开始并未就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达成共识。正如梅森所指出，坦桑的联合“大概率是一次历史偶然事件”。<sup>④</sup> 这种偶然性的联合导致了坦桑尼亚初期面临财政、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混乱。桑给巴尔前总统琼布认为，1964年的《联合章程》最初只是暂时性的安排，然而这一临时性安排也最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sup>⑤</sup>

① 坎博纳在坦噶尼喀政府内部坚称，桑给巴尔是坦噶尼喀的一部分，这让尼雷尔也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参见“Zanzibar: The Hundred Days' Revolution”，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sau-28, p. 121。

② 时任中国驻桑给巴尔副馆长的金伯雄在回忆录中也谈道：“卡鲁姆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加上通过坦噶尼喀大陆可以保障其国家安全，于是在瞒着巴布的前提下与尼雷尔商讨联合的事情，并迅速通过。”参见金伯雄《我的非洲岁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59页。

③ 1964年3月8日，桑给巴尔宣布确立一党制，乌玛党党员并入非洲设拉子党。

④ H. Mason, “Asymmetrical States Worldwide”, in T. L. Maliyamkono and H. Mason, eds., *A 100 Academics Search for Katiba Bora Tanzania*, Dar es Salaam: TEMA Publishers Company Ltd., 2014, p. 36.

⑤ Jumbe, *The Partner-Ship: Tanganyika-Zanzibar Union: 30 Turbulent Years*, Beltsville: Amana, 1994, p. 31.

即使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坦桑尼亚仍能够继续存在，因此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是，坦桑联合取得成功的历史逻辑。笔者认为，坦桑联合得以成功的历史逻辑可归结于以下三点。

第一，从历史背景而言，坦桑联合是非洲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思想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非洲民族主义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坦桑联合的历史契机来自桑给巴尔革命，然而，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非洲民族主义引导下的革命。<sup>①</sup> 所以，坦桑联合的核心思路是延续非洲民族主义，认为桑给巴尔属于非洲国家。这是非洲其他意图政治联合地区所不具备的历史原因。在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上，主要牵头者是坦噶尼喀的坎博纳。坦盟与桑给巴尔时任执政党的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联系。桑给巴尔革命前，非洲设拉子党的资金援助与武器支援主要源于坎博纳的支持，<sup>②</sup> 坎博纳通过阿尔及利亚与英国伦敦方面为非洲设拉子党成员筹备武器。<sup>③</sup> 双方的非洲民族主义联系为彼此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第二，从现实政治而言，坦桑联合符合当时尼雷尔与卡鲁姆等人的政治诉求。坦桑联合的契机是桑给巴尔革命后的政治局势。桑给巴尔革命后，虽然非洲设拉子党的执政理念与激进的非非洲民族主义者无异，<sup>④</sup> 然而，革命中以巴布为另一派别逐渐接手革命后桑给巴尔的外交政策，

① 桑给巴尔独立前的政治斗争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一些文献中被解读为“阿拉伯人”与“非洲人”的斗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与“非洲”并不单纯指种族属性，更多表达的是政治属性上的倾向。关于对桑给巴尔革命与斯瓦希里文化的分析，可参见高天宜《坦桑尼亚设拉子人身份认同转变及其影响探析》，《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6期，第105~114页。

② 对于尼雷尔是否知道桑给巴尔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尼雷尔对桑给巴尔革命一事并不知情，因为桑给巴尔革命之后，肯尼亚和乌干达第一时间承认了桑给巴尔，尼雷尔虽然倾向于非洲政府，但他认为，“政府是被暴力推翻的，这一点不能成为一个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没有第一时间承认桑给巴尔新政权。参见“Ambassador Leonhart Reports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Nyerere”，CK-2349143211，Gale Group，Inc.，Jan. 13，1964。

③ “A Current Appraisal of the Zanzibar Situation”，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DOC-0000126868，Feb. 1，1964，p. 2。

④ 巴布认为，非洲设拉子党的政治死结在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而非政治上的主义”。参见A. M. Babu，“The 1964 Revolution：Lumpen or Vanguard？”in Abdul Sheriff，Ferguson，ed.，*Zanzibar Under Colonial Rule Eastern African Studies*，London：Ohio University Press，1991，p. 234。

桑给巴尔开始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sup>①</sup>在内部几乎架空卡鲁姆的权力。<sup>②</sup>桑给巴尔党内政治斗争激烈,1964年1月30日,曾被桑给巴尔联合政府任命于农业部的苏莱曼·哈提卜(Suleiman Khatib)在向内罗毕和坎帕拉的穆斯林社区通报桑给巴尔发生的事件时谈道:“巴布已完全将权力掌握在手中……非洲设拉子党内对巴布的领导持强烈的反对意见。”<sup>③</sup>对于卡鲁姆而言,趁巴布在外进行国事访问,仓促联合,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党内斗争将巴布及其党羽排挤出桑给巴尔。对于尼雷尔而言,他所需要的是迅速建立一个得以掌控的联邦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东非联邦问题上,尼雷尔无法等待东非联邦漫无止境的商议,“如果一直等下去,等到各国间的问题都解决了,各国的内政问题也解决了,那任何联邦或任何形式的统一组织就再也成立不起来了”。<sup>④</sup>在这一时期,尼雷尔认为自己泛非主义领导者的地位受到恩克鲁玛<sup>⑤</sup>与桑给巴尔方面的威胁。对于亟须确立泛非主义领导地位的尼雷尔而言,与桑给巴尔的联合提供了这一解决方案。桑给巴尔成为尼雷尔巩固坦噶尼喀在非洲解放运动当中的领导权以及泛非主义运动话语权<sup>⑥</sup>的一把钥匙。坦桑尼亚学界知名学

① 即使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卡卢奇也不得不承认,纵然非洲很多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但“桑给巴尔的社会主义道路更为明确且有决心”。参见“*Ambassador Frank Charles Carlucci*”, III, *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Apr. 1, 1997, p. 29。

② 赛义夫·谢丽夫·哈马德(Seif Sharif Hamad)曾谈到巴布在1964年2月私下谈论,“到明年此时,我将成为桑给巴尔总统”。可参见G. Thomas Burgess, *Race, Revo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Zanzibar: The Memoirs of Ali Sultan Issa and Seif Sharif Hamad*,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3。

③ “Suleiman Khatib, a Civil Servant Formerly Employed as a Field Instructor in the Zanziba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CK-2349143234, Jan. 30, 1964。

④ [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第一卷),韩玉平译,沐涛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19页。

⑤ 加纳阿克拉电台在1964年1月29日提到坦噶尼喀兵变时谈道:“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在非洲枪杀非洲人的场面本应被遗忘,但却成为获得独立的坦噶尼喀为恢复军纪而不得不重提的事件。”参见“*Times Scores Call on British Troop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FRB-64-021*, Jan. 29, 1964。

⑥ 坦噶尼喀是英国在中东非地区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同时也是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核心地区,在尼雷尔看来,这代表了坦噶尼喀有领导非洲国家走向独立的资质。在1963年5月25日亚的斯亚贝巴的讲话中,尼雷尔强调,“此次会议指导我们决心消除大陆上剩余的殖民主义残余,并决心看到一个以统一声音说话的非洲”。参见“*Text on Nyerere Speech at Summit Parley*”,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FRB-63-104*, May 25, 1963。

者希维吉也认同这一观点：坦桑联合是基于政治实用主义，而不仅仅是泛非主义的愿景。<sup>①</sup> 尼雷尔便将展现泛非主义领导权的希望寄托在与桑给巴尔联合上。

第三，从实践角度而言，坦桑联合得以维持在于坦方的政治智慧。首先，两国在联合之初对联合的认识具有明显差异。对于包括尼雷尔在内的坦桑尼亚大陆官员看来，桑给巴尔只是享受一种区域性自治。对于卡鲁姆而言，坦桑联合仅仅是其确立桑给巴尔领导权的一种方式。卡鲁姆曾言，“联合是一件外衣，天气冷的时候我就穿上；否则我就脱下它”。<sup>②</sup> 其次，联合政府初期的组织结构混乱。在《联合章程》之下，坦桑尼亚由坦桑尼亚政府和桑给巴尔政府组成，没有对应的坦噶尼喀政府。希维吉推断，最初的目的是建立三个政府的联邦结构，而不是现如今的两政府模式。<sup>③</sup> 从卡鲁姆对待联合问题的认知来看，可以推断出尼雷尔有意模糊联合的概念，使其更符合卡鲁姆的设想，从而维持联合状态。卡鲁姆时代的桑给巴尔与坦桑尼亚大陆之间呈现一个特点：只要卡鲁姆不公开反对坦桑联合一事，尼雷尔默许卡鲁姆在桑给巴尔有着绝对的行政权。这也造就了在卡鲁姆时代，坦桑尼亚作为一个一党制国家，却拥有两个相对独立的政党——坦桑尼亚大陆的坦盟与桑给巴尔的非洲设拉子党。最后，在后卡鲁姆时代，坦方愿意分享权力以维持联合稳定。随着1972年卡鲁姆遇刺，尼雷尔通过与卡鲁姆继任者琼布的合作，将大陆执政党坦盟与桑给巴尔执政党非洲设拉子党合二为一成立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坦桑尼亚学者波西谈道：“尼雷尔秘密运用法律手段拓展坦桑尼亚政府在联合事务中的权能，从而实现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密融合。”<sup>④</sup> 另外，1992年坦桑尼亚选举改革确保总统候选人及其副手不得来自同一地区，从事实上确保了桑给巴尔的政治权力。<sup>⑤</sup>

① 参见 Issa G. Shivji, *Pan-Africanism or Pragmatism? Lessons of the Tanganyika-Zanzibar Union*, Dar es Salaam: Mkuki na Nyota Publishers, 2008.

② G. Thomas Burgess, *Race, Revo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Zanzibar: The Memoirs of Ali Sultan Issa and Seif Sharif Hamad*,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1.

③ Issa G. Shivji,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on in Tanzania's and Zanzibar's Constitution*,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28.

④ Japhace Poncian, "Fifty Years of the Union: The Relevance of Religion in the Union and Zanzibar Statehood Debate",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2014, p. 167.

⑤ 坦桑尼亚前总统马古富力2021年因病去世，其副总统桑给巴尔人萨米亚·哈桑继任为总统，成为坦桑尼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由此可以推断,1964年坦桑联合的主导力量源自坦噶尼喀方,而桑给巴尔方面则呈顺应态势。坦桑联合经历了一次隐秘的政治策略,双方领袖的共同意愿成为该策略实施的主要动因。其中既有基于双方现实政治因素做出决策的因素,同时也显现出联合举措在非洲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思潮中的高度融合。坦桑尼亚的政治智慧成为维系坦桑联合的重要保障。

## 结 语

作为现如今非洲唯一实现泛非主义理想的范例,坦桑联合可视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个缩影,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对推动非洲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实际上,学术界无论是“冷战政治决定论”还是“泛非主义决定论”,都有其一定的正确性,但二者都忽视了历史关键人物在行动前的逻辑串联,同时忽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整体的政治背景。

坦桑联合问题涉及的三个历史遗产同样值得学者深思。

首先,对于坦桑联合问题的研究应当避免陷入“因果决定论”的误区,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于单一的原因。相反,应当从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历史的本质,探究坦桑联合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非洲政治史中的重要事件,为当今非洲及世界政治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启示。对坦桑尼亚自身而言,官方材料中关于两个政府结构和桑给巴尔身份的探讨问题事关联合的存亡,是“联合捍卫者与分裂者的对抗”。<sup>①</sup>这也是目前坦桑尼亚官方意识形态下不可变动的守则。所以,坦桑联合在历史方面确实需要进行批判性的认知,双方的联合并非官方意识形态或是冷战政治因素造成的结果,但正如希维吉所言,坦桑尼亚解体并不会解决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反而会造成新的困难。<sup>②</sup>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认识,才能从辩证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坦桑联合的历史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争议。

① Francis Semwaza, “On the Fate of the Nation: Party Politics, Resources and Tanzania’s Democratic Experienc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9, No. 9, 2016, p. 148.

② Issa G. Shivji, *The Legal Foundations of the Union in Tanzania’s and Zanzibar’s Constitution*,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

其次，应重视对非洲思想史的批判与分析。自20世纪50年代非洲国家追求独立以来，在泛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影响下，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主权思想中一直包含着双重含义——非洲民族主义下的民族主权与作为政治国家的国家行政主权。国家主权意识的唤醒，本质上是非洲政治思想中的“单一民族”与“泛非团结”转变成互为矛盾的个体。所以，坦桑联合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的“偶然”<sup>①</sup>，并非暗指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的政治力量交互影响却无规律可循，实则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国家组建联邦制国家已不太可能。坦桑联合之所以特殊，既有联合之初桑给巴尔局势的特殊性，也有联合之后尼雷尔对于联合实质问题的政治智慧。

最后，非洲政治史研究的主体应有所改变，应展现非洲人在其历史中所表现的能动性与思想变动。这种主体并非单纯以“泛非主义”等术语一言以蔽之，造成对规则塑造的依赖与崇拜，应重视史料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国内的非洲历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经常强调一点：要从非洲人的角度去看待非洲问题。国内学界所推崇的观点，并非一种宽泛的概念，也并非将官方资料照本宣科般地引用，这种视角需要以切实的当事人视角为出发点，深入资料当中去探寻，并在学术成果中进行批判性的认知，其是将历史回归到人的一种研究方式。

【责任编辑】王珩

<sup>①</sup> H. Mason, "Asymmetrical States Worldwide", in T. L. Maliyamkono and H. Mason, eds., *A 100 Academics Search for Katiba Bora Tanzania*, Dar es Salaam: Tema Publishers Company Ltd., 2014, p. 36.

## Egypt's Regional Diplomacy in Sisi's Era: Pressures, Process and Effects

*Liu Yun / 21*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Egypt's regional diplomacy during Sisi's era, and its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the Arab region and Africa. 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 inter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dysfunctional countries had a huge impact on Egypt's foreign policy. Due to the severe economic crisis in Egypt, it is important to maintain strong ti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GCC and most importantly Saudi Arabia, the UAE, Kuwait and Bahrain. The efforts of President Sisi and his team to fully restore Egypt's leadership in the Arab world have not only affecte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but als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nd North Africa.

**Keywords:** Egypt; Foreign Policy; Sisi; Arab Countries; Africa

## Revisiting the Lessons of the Tanganyika-Zanzibar Union in 1964

*Gao Tianyi / 37*

**Abstract:** For the stud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and Pan-Africanism ideology, the coalit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is a fundamental issue in academia, which focuses on the reasons, motives, and impacts of the un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s views on the Tanganyika-Zanzibar union are discussed around two major models, namely "Cold War politics" and "Pan-Africanism ideology", yet both perspectives infer the causes from the results and fail to explain the uniqueness of Tanzania as the only special case of a union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s that has continued in Africa to this day. Additionally, they lack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motivations on both sides of Tanzani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lthough the political leaders on both sides of Tanzania had different political goals for the union, the union not only met the political demands of both sides but also demonstrated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African nationalism and Pan-Afric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Behind this, it revealed a turning point i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Tanganyika-Zanzibar Coalition; Cold War Politics; Pan-Africanism; Nyerere

## Ca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hape State Capacity?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Cheng Zilong / 52*

**Abstract:** There is a linear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goods, state capac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ate capacity is the guarantee of providing public goods, and a stable and fair supply of public goods by a govern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domestic conflict recurrence. As an important public good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ore logic of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s can be fundamentally solved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of “fragile states”. So, can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hape the state capacity of the state concerned to supply public good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UN mission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found that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an better play a role of temporary public sector, but not qualified enough to shape the state capacity of the state concerne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 are tha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 peaceful environment as a prerequisite for peace building, actively seek support from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fo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define the limits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On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its core functions,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a n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he local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Keywo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ublic Goods; State Capacity; Civil Conflict